

刘少奇党建思想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张金荣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 刘少奇吸收儒家的修养论创立了共产党人的修养理论,吸收儒家的人生观,塑造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吸收儒家的方法论,形成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作者认为,刘少奇的党的建设思想是正确对待我国历史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典范。

关键词: 刘少奇; 党的建设; 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3)02-0173-04

刘少奇说过:“在我们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1]1(240)}而他的党的建设思想,在关于共产党人的修养、共产党人的品质和共产党人的作风等方面,批判地吸收和发展了儒家优秀文化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是正确对待我国历史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思想典范。

一、共产党人修养论对儒家修养论的继承

“修养”一词,来源于儒家学说中的“修身”和“养性”。《大学》中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1(22)}所谓“修身”指修养好自身的品德。《孟子》中有:“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3](350-351)}所谓“养其性”,就是培养人的本性。因为孟子主张性善论,所以每一个人只要把这种“善性”认真加以培养,就可以顺应天命。可见,“修身”“养性”在儒家看来,不仅是每一个人的必修课,而且是每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我们再从《大学》所谓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1(22)}的“为学次第”来看,儒家讲修身只是出发点,目的还是为了从政。这说明儒家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了从政者的个人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对于从政水平和业绩的提高

具有决定的意义。所以后人便将“修身”“养性”概括成“修养”一词,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乃至个人一切事务的前提条件。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修养》)一文中肯定“修养”一词,实际上也就肯定了儒家关于从政者个体素质对为政的重要关系的认识。刘少奇说:“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须有的修养。”^{[4]1(101)}刘少奇对儒家修养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修养的必要性、方法、目标等方面。

(一) 修养的必要性

刘少奇在论述共产党人修养的必要性时指出:“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4]1(101)}这里刘少奇是借用了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3]1(346)}的积极意义,用“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说明共产党人为了担负革命重任而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修养的必要性,而摒弃了孟子的天命思想。刘少奇在《修养》中首先从“人类本身,人类社会,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过程”的辩证唯物主义角度,论证了人们在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的必然性。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4]1(98-99)}“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

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4](98)}并强调指出：“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4](103)}刘少奇还引用了《论语》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并点明“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接着刘少奇从孔子的认识论具有唯物经验论倾向的角度肯定了孔子“并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4](101)}。的确，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5](81)}。表明像孔子这样在封建社会被尊为“圣人”的人，自己都不承认是“生而知之者”，而是通过在实践过程中的修养，使自己逐步成熟起来的。进一步论证了“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要变成为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的必要性。^{[4](100-101)}

(二) 修养的方法

“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革命的锻炼和修养的过程。”^{[4](99)}如何“锻炼和修养”？刘少奇说：“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4](101)}此借用出自《孟子·告子下》，旨在激励共产党员要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勇于锻炼自己。

刘少奇还运用古代儒家“慎独”的思想，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4](133)}。“慎独”见于《大学》：“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2](42)}又见于《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2](87)}。它要求道德主体真正做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2](87)}。刘少奇借鉴了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将“慎独”用于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与实践中，将古代的道德信条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以此启迪共产党员应该自觉遵守党纪和社会规范。

以上“苦其心志”“自省”“慎独”都是儒家提倡的修生养性方法。刘少奇首先肯定了儒家修养方法在共产党人的修养中的可借鉴性：“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但同时又指出：“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4](109)}这一批判是击

中要害的。这里讲的“善良之心”，实际就是孟子鼓吹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人都有仁义礼智“四端”，“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3](94)}这样，孟子就把道德修养过程说成自我扩充先天生就的善端的过程，说成一个纯主观的、与社会实践毫无关系的过程。这正是刘少奇批判的“抽象的‘善良之心’”，指出这种修养方法是“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提出：“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4](109)}“我们要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总之，我们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他强调指出：“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员修养的方法。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和其他唯心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4](110)}强调了实践在共产党人修养中的极其重要性。这样，刘少奇将共产党人的修养方法和中国传统的修养方法又相区别开来，达到了批判与继承的有机统一，使“苦其心志”“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建立在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之上。

(三) 修养的道德目标

“人皆可以为尧舜”^{[3](321)}是《孟子》中的名言。这句话是对孔子“我欲仁，斯仁至矣”^{[5](85)}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者，都非常强调道德修养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认为只要道德主体坚持不懈，努力追求，就可以达到既定的道德目标，实现成圣成贤的道德理想。在儒家看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有崇高的德行，能克己复礼，博施济众，安邦兴国，实现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这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和行为典范。“人皆可以为尧舜”乃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刘少奇正是看到了这一命题的积极意义，在谈到共产党员修养的目标是“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4](104)}时，针对当时一些人以为革命导师的思想和品质“高不可攀”“学习不到”的思想状况，借用了《孟子》中这句名言，以此激励共产党员积极向上。他说：“《孟子》上有这样一句话：‘人皆可以为尧舜’，我看这句话说得不错。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尽可能地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不应该望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伟大的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质，认为高不可攀，就自暴自弃。”^{[4](109)}

弃，畏葸不前。如果这样，那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朽木’。”^{[4](106)}这对于启迪共产党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革命导师为榜样，努力修身，不断进取，有积极意义。

二、共产党人品质论对儒家人生观的继承

刘少奇在列举共产党人应有“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道德”时，其中的一条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4](132)}这种进退皆忧，宠辱不计，始终以天下国家为重，满怀忧患心理的儒家人生哲学，被刘少奇用来教育党员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宋代名儒范仲淹对“古仁人之心”的高度概括。孟子认为，士君子对个人进退的态度应是：“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3](355)}这是儒家关于个人与社会、出仕与蜗居态度的经典概括，反映了儒家“从容进退”的文化心态。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5](92)}主张士君子要刚强有力，以实现仁德于天下为己任，反映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士们的历史责任感。怀着这种历史责任感，孔子及其以后的儒士们，都积极从事政治活动，试图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普及天下。这种社会责任感，在唐宋以后的知识分子中已经模式化，成为一种普遍的人格心理和文化心态。

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曾批评“某些同志‘独善其身’的保守心理”。^{[4](199)}从上述内容可知，儒家是将“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统一起来的，但人们如果只取其一端，只重“独善其身”，不注意“兼善天下”，那当然就是一种“保守心理”，而且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刘少奇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一切革命阶级的利益，代表自己民族的利益。”^{[4](118)}共产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党除了谋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特点和全部任务。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孟子所称道的“此之谓大丈夫”。^{[3](162)}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担负着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因此，刘少奇说：“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4](133)}真正大公无私、在革命实践和马列主义的学习中不断提高自己觉悟的共产党人，“有‘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4](132)}这一借用，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与坚贞不屈，出色地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倡导的道德精神。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5](193)}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3](308)}“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体现了儒家重视道德的价值，主张对于崇高道德不惜用生命去捍卫它，这对于人们培养高尚的节操和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我国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的高尚情操，无不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有着血肉的联系。当然，这一思想在封建时代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它可能把一些人引上为封建统治者尽忠尽孝的道路，乃至为少数封建统治者作无意义的牺牲。基于这种情况，刘少奇指出：“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但是，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我们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视死如归地、毫不犹豫地牺牲了他们的一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这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革命狂热或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了解和高度自觉。除了这种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以外，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更崇高的道德。”^{[4](133-134)}刘少奇又指出：“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4](131)}“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4](130)}“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价值观，经过刘少奇阐发，便成为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使其建立在了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基础之上。

三、共产党人作风论对儒家方法论的继承

孔子曾教导子路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5](18)}这是要求做人要讲真话。对共产党人而言，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刘少奇指出：“我们一切同志对一切的问题，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决定的事情一定要是自己相

信的,如果自己还无把握相信的事情,可以保留下来再加以研究或请示。”^{[4](198)}这就是要求共产党员要讲真话,不要不懂装懂,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主张所有的共产党员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必须讲真话,做到实事求是。

《孟子》:“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3](97)}可见孟子的“善与人同”本意是要人不要固执己见,而要善于听从他人的正确意见,学习和吸取他人的长处,能同他人一起行善。这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因此,刘少奇用来说明在处理党内非原则分歧时,要善于妥协和让步,要与人为善。刘少奇说:“如果我们发生有不同的意见,只要不涉及到原则上成为问题,我们就要善于妥协,善于让步,善于接受与同意别人的意见,‘善与人同’,然后事情才能畅快地办理,问题才能爽快地决定;而不应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总是要别人放弃意见,总是要别人来将就自己,总是要别人照自己的意见办理,这样反而要拖延问题的解决,妨害工作的进行,增加党内纠纷与清谈的倾向,妨害同志间的相互团结。”^{[4](205-206)}

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5](73)};“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197)}。这种忠恕之道的心理趋向是“推己及人”。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5](195)}。因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5](158)}。“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5](160)}孟子更是深得“正己正人”思想之精髓,主张“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这样才能使“其身正而天下归之”^{[3](192)}。儒家的“正己正人”的思想,就其内容和方法而言,是把人锁在道德修养领域之内,用经验直观的简单外推,来实现匡时济世的大志,有其偏颇之处。不过,就其端正自己再端正别人,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思维形式和方法而言,有其可取之处。刘少奇正是从这一积极意义出

发,用“必先正己,然后才能正人”,说明进行党内斗争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和正派的作风。指出:“只有自己首先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才能纠正人家不正确的立场;只有自己是完全正派的,然后才能矫正别人的不正派。所谓‘必先正己,然后才能正人’。”^{[4](209)}这对于共产党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有着重大意义。

《论语》:“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5](134)}孔子认为,处理事务时,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过头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它反映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孔子还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5](68)}这也是说,量的过和不及都会影响质的性质。只是孔子衡量“过”或“不及”的标准是周礼。社会变了,它早已失去作为标准的资格。刘少奇用“过犹不及”的思想说明党内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时指出:“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就有布尔什维克的尺度。一切过分的批评,夸大人家的错误,滥给别人戴大帽子,都是不对的。党内斗争不是斗得愈厉害愈好,而应有适当限度,应讲求适当,‘过’与‘不及’都是要不得的。”^{[4](211-212)}刘少奇的“过犹不及”不仅体现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且确定了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标准,体现了批判、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因此,刘少奇又指出:“适当的批评,适当的态度和适当的方式,反对‘过’与‘不及’,这就是我们在党内斗争中所应采取的方法。”^{[4](212)}

参考文献:

- [1]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2] 梁海明.大学·中庸[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
- [3] 李学勤.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4]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5] 程昌明.论语[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

Liu Shaoqi's ideology on CPC construction: A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ZHANG Jinro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Liu Shaoqi, by drawing critically on Confucianism, has set us a perfect example to approach correctl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thoughts. Liu's ideas thus serve as the guideline of the cultivation of CPC members and will contribute a lot to the shaping of their noble qualities and the party's good working style.

Key words: Liu shaoqi; the construction of CPC; Confucianism